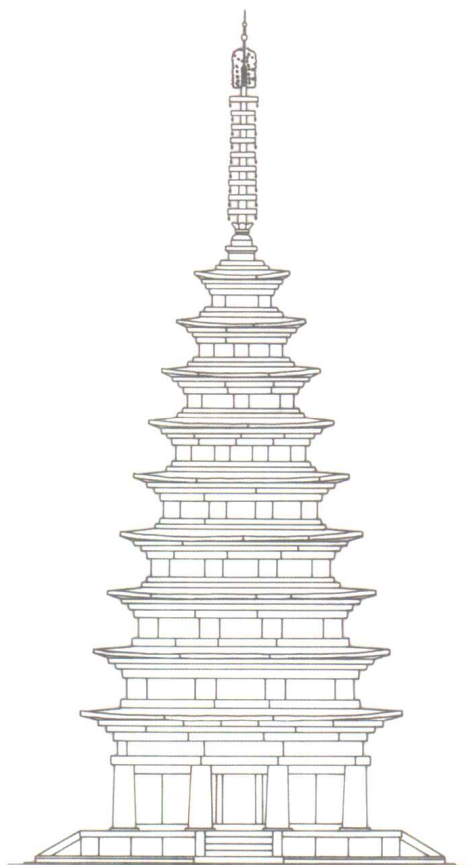


7~8 世纪 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 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
大阪经济法科大学

编



科学出版社

083

3

7~8 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 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 编
大阪经济法科大学

科学出版社

2001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和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召开的题为“7~8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此次讨论会也是东亚国际讨论会历史部会所召开的“东亚文化交流的诸问题”的第五次会议。本书共收录了中、日、韩、朝四国学者的学术论文 17 篇,内容涉及7~8世纪时期中国的渤海、吐蕃、东突厥等民族历史考古问题,北方地区唐墓、唐代戒指、武器的外来影响等专题,以及国外学者关于日本古坟、都城与都城变迁、遣隋唐使、韩国寺院、平壤长安城等问题的研究。

本书对于研究东亚地区的历史、考古及各国间的相互交流的学者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7~8 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 编
大阪经济法科大学

责任编辑 陈菊华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新蕾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1 年 2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1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9

印数:1—1 200 字数:206 000

ISBN 7-03-008947-2/K·140

定价: 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环伟〉)

2001.1.15

考古书店

目 录

序文	〔日〕村川行弘(1)
开幕词	严文明(4)
问题提起:7~8世纪东亚的历史和考古	〔日〕西谷 正(6)
中国北方地区唐墓	齐东方(8)
50年来中国渤海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魏存成(16)
对东海岸一带发掘的渤海遗迹和遗物的考察	〔朝〕金钟赫(21)
都兰吐蕃墓葬发掘和研究	许新国(26)
7~8世纪韩国考古学的现状和课题	〔韩〕申敬澈(31)
7~8世纪的韩国寺院	〔韩〕金正基(34)
日本古代都城的建立与发展	〔日〕工乐善通(45)
日本的终末期古坟	〔日〕河上邦彦(52)
唐朝安置东突厥降众考	吴玉贵(56)
论渤海与唐朝的政治关系	于汝波 钟少异 张 忠(82)
渤海国的海陆交通与盛唐文化在东北亚的传播	王 侠(87)
7世纪高句丽的强盛与平壤长安城	〔朝〕郑哲万(96)
日本律令制都城的变迁和遣隋·唐使	茆 岚(101)
渤海考古若干问题的新进展	陶 刚(109)
吉林和龙县河南屯古墓年代再讨论	傅佳欣(113)
唐代的戒指	黄正建(118)
6~8世纪中国武器中的外来影响	钟少异(125)
总结发言	〔日〕西谷 正(136)
在“7~8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的讲话	李伯谦(138)

序 文

〔日〕村川行弘

(大阪经济法科大学)

1997年7月11日,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历史学考古学代表团(村川行弘、桥本久、朴宗彬)在北京会见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李伯谦教授,翻译由文重教授担任。原定当日出席的严文明教授因生急病未能履约,由文重教授通过电话听取了他的意见。

讨论的主题是关于1998年举办第5次东亚国际讨论会历史部会的“东亚文化交流的诸问题”的共同研究题目、参加者和举办场所的确定。讨论了原来提出的“7、8世纪的东亚”这一题目。东亚诸国在中国的隋唐中央集权国家兴盛之时,进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的时期。将东亚各地当时的状况作为同时代史而共同享有是我们的目的。

李伯谦教授同意设定这个题目。准备报告中国东西南北地区的最新研究成果。他还接受了于1998年北京大学创立百年纪念的年份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提议。

7月12日,代表团访问了接受了正式邀请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平壤会见了以朝鲜社会科学院第一副院长金哲式、外事局局长郭善旭为首的干部研究者。他们对共同研究的题目表示赞同,并约定正式发表该国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关于举办地点,接受了先锋·罗津开发区作为讨论对象的提议。

当时俄罗斯也询问能否在海参崴的远东大学举办,归国后在与大学协商的基础上决定了举办地点。

大学执行委员会协商的结果是,从祝贺北京大学创立百年纪念的立场出发,决定第5次东亚讨论会历史部会于1998年8月5日至8日,在北京大学共同举办。直接向李伯谦教授报告了讨论的结果,在得到他的赞成的同时,请他做举办会议的准备。李伯谦教授也得到了北京大学校方的支持,决定在北京大学和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的共同主持下,举办历史部会。因此,李伯谦教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准备会议期间,李伯谦教授曾赴美国讲学,由齐东方教授代行处理实际事务。而在做预算和报告者的选择等方面,事务局和处理实际事务的人一直付出着心血。

后来确定各国都由第一流的专门研究者报告最新的研究成果,邀请20位先生做研究发言。遗憾的是因办手续的缘故,没有俄罗斯方面的与会者。

历史部会每次都有可以“改写史书”的研究成果发表。详细的内容有报告论文和西谷正教授的总结,在此介绍日本方面旁听者的感受。

日本的榎原考古学研究所调查部长河上邦彦得到主持者的协助,通过幻灯报告了黑冢前方后圆坟以大量铜镜随葬的情况,使与会者感到震惊。这是东亚出土的最多的一批铜镜,首次对海外研究者公开发表。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研究调查中心的所长工乐善通从与中国、朝鲜半岛文化交流的角度对藤原京到平城京的都城变迁发表了新见解。这

是多年研究成果的集成,对于今后东亚的都城研究给以了重要的指导。

中国方面为了介绍幅员广阔的中国各地区的研究现状,注意了报告者的选择。北京大学的齐东方教授以丰富的图画报告了中国东北地方的唐代墓葬的发掘情况。青海考古研究所所长许新国用录像介绍了都兰吐蕃墓发掘调查所获知的反映与波期萨珊交流的发掘成果,使到会者大开眼界,特别是青海湖周围的热水王墓和库车王国遗迹等,是首次介绍柴达木盆地都兰发掘的情况。与会者对这一划时代的发掘成果瞠目惊视。中国人民大学的茆岚副教授以唐朝和日本的交流为中心,介绍了从中国方面看到的日本遣唐使的活动。吉林大学的魏存成教授发表了中国境内的渤海遗迹的考古学和文献方面的研究。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文物管理所所长陶刚则发表了关于渤海上京龙泉府的最新的见解。钟少异教授指出了中国武器特别是佩带方面所见到的在外国的影响,报告了研究中所发现的与西亚、北亚交流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黄正建发表了唐代戒指的综合研究成果。日本发现过1世纪至2世纪的从乐浪传入的戒指和5世纪至6世纪从新罗传入的戒指,而7世纪、8世纪的戒指全然无存,所以该成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侠发表了关于渤海国与日本的交往路线及与北亚的关系的研究成果,特别介绍了黑水靺鞨在海外活动的史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玉贵详细报告了唐朝安置东突厥的过程。于汝波教授和钟少异、张忠共同发表了对渤海和唐的政治关系的研究。虽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学者提出了疑问,但一致承认在制度方面是君臣关系。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傅佳欣研究员探讨了吉林省和龙县河南屯古坟群的族属,他通过对遗迹和遗物的分析,阐述了这批墓葬不是渤海墓葬而是金代女真人墓葬的观点。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考古研究所的金钟赫室长报告了东海岸的渤海遗迹的发掘成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所的郑哲万副所长以平壤长安城为中心介绍了文献考证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朝鲜社会科学院的正式的观点。

以上发表的研究使与会者震撼和感动。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的郭善旭外事局局长要求特别发言表达谢意:“向高度评价第一次东亚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来的国际共同研究的成果、致力于通过这一学术讨论会推进相互信赖和友好关系及国际性协作关系的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的努力表示感谢。”

日本以同志社大学铃木重治教授为首的20多位会议旁听者,共同聆听了研究成果。

在会议闭幕当日的晚餐会上,全体与会者唱歌、跳舞、谈笑、握手,一派热烈的友好交流场面。

北京大学的李伯谦、严文明、齐东方教授等考古系、博物馆有关人员付出辛勤劳动,使这次学术讨论会得以成功地举办,在此由衷表示谢意。

同时,也对日本方面予以帮助的九州大学西谷正教授,承担具体事务的本学校的桥本久教授、华立教授、朴宗彬副教授、前圭一副教授、桑原武志讲师和亚洲研究所玄善允事务长表示谢意。还要对列席这次会议并代表大学致辞的亚洲研究所中村泰三所长、综合科学研究所米泽富士所长以及进行联系、办理事务的亚洲研究所的各位职员致意。

1998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以何芳川副校长为首的代表团访问大阪经济法科大学,表达了进一步发展自1986年以来历经12年的姐妹校关系的愿望。何芳川副校长是历史

学教授,特别对这次历史部会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下次的第六届东亚国际学术讨论会预定在公元 2000 年举办,想以对 20 世纪的总结和面向 21 世纪的东亚各国共有的国际共同研究为目标,预定的研究题目是“2000 年前的东亚”。

1999 年 1 月 17 日

开 幕 词

严文明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各位先生,朋友们!

7~8世纪东亚地区的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现在开幕。首先,请允许我对前来参加会议的各国学者和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炎热的夏天,应该是休闲避暑的季节。各位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大学,讨论东亚历史与考古学上的重大问题,是我们北京大学的荣幸。我谨代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关于古代东亚历史与考古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的主持下已经举行过4次了。这4次会议曾经分别就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展开、东亚考古与历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东亚古代文化交流和东亚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再检讨等课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讨论,我有幸参加了其中的3次,深感组织这样的会议十分必要,它促进了有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加深了各国学者之间的理解和友谊,是应该大力提倡的。在这里,我要特别谈一谈对我们的会议有着特殊贡献的村川行弘先生,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和孜孜不倦的努力,才使我们的历届会议获得成功。1994年,他为了组织第4届讨论会到北京来,在街上不幸腿部被严重挤伤。当我们到医院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完全不顾自己的伤痛,坚持向我们介绍和商量会议的准备工作。1995年在大阪开会时,他坐着轮椅坚持参加了整个会议,还陪我们到神户进行学术访问。为着把会议开得更好,也为着扩大会议的影响,他很早就提议分别在东北亚各国轮流召开。我说各国的条件有所不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安排。这次北京的会议,也是几经磋商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对于他为发展学术研究,加强东亚各国学者之间的联系与学术交流所作的努力,我们是十分敬佩和感激的。

经过商量,本次会议的主题确定为7~8世纪东亚地区的历史与考古。这个时期的东亚在世界历史上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因为这时的欧洲正处在封建主义的黑暗时代,而东亚各国则是文明昌盛的辉煌时期。当时的长安是世界最大的都会,包括西方各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使节、学者、僧侣和商人云集在那里。人们在谈到中国的历史时往往用汉唐盛世来指称汉唐两代,不过唐代的昌盛又有别于汉代并且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汉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唐代比汉代更为开放,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对外交流。这个时期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社会经济文化也飞速地发展起来,这两个地方同唐代的交流也最为密切。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关于这些地方之间相互交往的记载,值得我们仔细研究。更加令人兴奋的是,近年来东亚各国的考古工作都有很大的发展,发现了许多7~8世纪的实物资料,例如日本的高松冢和鸿庐馆的发掘,以及朝鲜半岛龙江洞的发掘等,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中国和俄罗斯也有不少新的发现,其中渤海国的资料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注意,使学术界对于7~8世纪的东亚的历史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相信在这次会议上大

家会充分交流信息和研究成果,相互切磋,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我们的会议一定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谢谢大家。

1998年8月6日

问题提起:7~8世纪东亚的历史和考古

〔日〕西谷 正

(日本九州大学)

“东亚的社会和经济国际学术讨论会”考古学、历史学专题中,到现在已经就“五千年前的原始、古代文明的再检讨”(1995年第4回)、“稻作农耕的起源及展开”(1991年第1回)、“文化交流的诸问题”(1993年第3回)、“考古学、历史学的现状和渤海史研究”(1992年第2回)等以原始、古代为中心的诸问题展开了讨论。

此次第5回学术讨论会的主题定为7~8世纪的历史与考古,可以说是站在总结以前的论题角度上而设定的。

7~8世纪的东亚,处于一个东亚各地区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大的历史转换时期。首先,中国大陆,自后汉灭亡(220年)以来,终于给经历370年分裂和混乱的时代划上了终止符。也就是说,隋王朝(581年)统一了分裂的魏晋南北朝,但是,由于隋朝进行大规模的土木工程,以及三征高丽等国内外失政行为,以致人民疲惫、社会不安,招致37年短命而亡。618年高祖建立的唐朝在10年后由太宗统一全国,迎来了和平的时代。唐代以律令体制确立了健全的中央集权统治,高度发达的文化、制度迅速影响到周边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东亚文化圈。

其次,朝鲜半岛,6世纪中叶新罗开始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土,吞并加耶,压缩高句丽、百济的势力范围,于7世纪后期完成统一大业。但是,7世纪末到8世纪初,在朝鲜半岛的北部和中国大陆东北部的广大区域内,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渤海。

在日本列岛,大和政权于6世纪前半叶几乎控制了全部地方豪族独立势力,打下了建立统一国家的基础。经过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8世纪初,统一的律令制古代国家登上历史舞台。

如上所述,7~8世纪的东亚地区,呈现出从分裂或近乎分裂局面走向统一的跃动状态。最终,和平时代终于来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迎来了繁荣时期。在此,作为历史的教训,让我们回味一下统一与和平的重要性。

此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东亚文化圈诸特征要素中摘取了几个问题。

第一,作为律令体制的具体体现之一的都城制问题。模仿唐长安建制,东亚诸国进行了都城建设。在此,关于模仿的程度和自己的地域特色的解析是非常重要的。曹喜胜先生论述了7世纪高句丽的强盛和平壤长安城,但有关平壤长安城的建制问题,隋大兴城以及东魏、北齐邺城又与之有怎样的关联?魏存成先生的关于渤海考古的几个问题和金钟赫先生的对东海岸一带发掘的渤海遗迹遗物的考察介绍了渤海考古学的最新成果。与此相关的俄罗斯正在进行的以Kra Skino土城为首的渤海遗迹调查应引起人们的关注。此外,如将长安城和上京龙泉府东京城、新罗月城加以比较,都城制度在波及过程中的地域

对称性问题是否也应深入讨论。申敬澈先生就新罗在 7~8 世纪韩国的遗迹现状中稍加说明,还有待今后的调查研究。与此相比,平城京的调查结果比较显著,结合藤原京的材料,工乐善通先生在日本古代都城的成立和发展一文中介绍了研究成果。附带提一下,在上述诸京中,有桥墩遗迹的调查发现,古代都城中的桥梁建设问题也应成为一个共通的素材。

其次,是都城和佛教寺院的问题。长安城内分布有众多寺院,渤海东京城、新罗京、平城京内也建有众多寺院,其中,就新罗京,金正基先生概括了 7~8 世纪的韩国寺院的结构布局。寺院除国家营造之外,尚有不同营造目的。有关诸寺院的性质还有待究明。

墓制方面,在受唐影响同时,也不能忽视各地区自身悠久的传统文化。齐东方先生就中国北方地区的隋唐墓进行了具体的检讨论证,其中指出的北方唐墓出土陶俑和新罗陶俑的比较这一新视点,对研究方向很有启发。联系河上邦彦先生的日本终末期古坟一文,想起上京龙泉府北部的三灵屯古坟,东亚诸地城墓制的相互比较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不仅是以上所述的东北亚地区,而且中亚及东南亚地区诸问题也应包括在内。以唐为中心的东亚交流史以及以唐为媒介的周边诸地域间的对比研究中,中亚和东南亚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在这方面许新国先生的“都兰吐蕃墓葬发掘和研究”可以说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最后,我认为东亚地区 7~8 世纪历史实相的解明,其共通性和独自性,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史等问题的研究,加深共同的认识是最为关键的,并希望以此作为此次学术讨论会的问题提起。

中国北方地区唐墓

齐东方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关于中国7~8世纪的墓葬研究,对于西安、洛阳,南方和渤海等地区研究较多,但如果将7~8世纪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作为一个大的文化区系考虑,特别是探讨7~8世纪东亚内部的文化交流等问题时,中国北方地区的地位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然而,正是这一地区的墓葬,在过去的研究中被忽视了。

中国北方地区是指辽宁朝阳、北京和河北地区,这一地区在唐代具有特殊性,南临唐朝政治、文化中心西安、洛阳,西、北面先后与突厥、契丹、奚、回纥、靺鞨杂处或相邻。“安史之乱”首先在这里爆发,以后又出现严重的藩镇割据。特殊的环境、历史传统和民族分布等原因,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出现了较为特殊的面貌。在墓葬制度方面,与西安、洛阳有极其密切的联系之外,也表现出区域性差异。

在东亚文化圈中,特别是7~8世纪,这个地区是联结中原与渤海、朝鲜半岛乃至日本的枢纽,各地间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北方地区几乎是必经之地。过去对这一重要地区缺乏研究的原因,一是资料不多,而且少量的资料发表零散,不易收集。二是在东亚地区7~8世纪古代文化交流研究尚未深入时,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尚未显现出来。

根据目前考古发现和东亚7~8世纪文化交流研究的现状,中国北方地区唐墓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显得更加突出了。

唐代是南北朝之后中国空前统一的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最为繁荣的时期,解释唐代文化与渤海、朝鲜半岛乃至日本的交流,解决问题的钥匙也许在北方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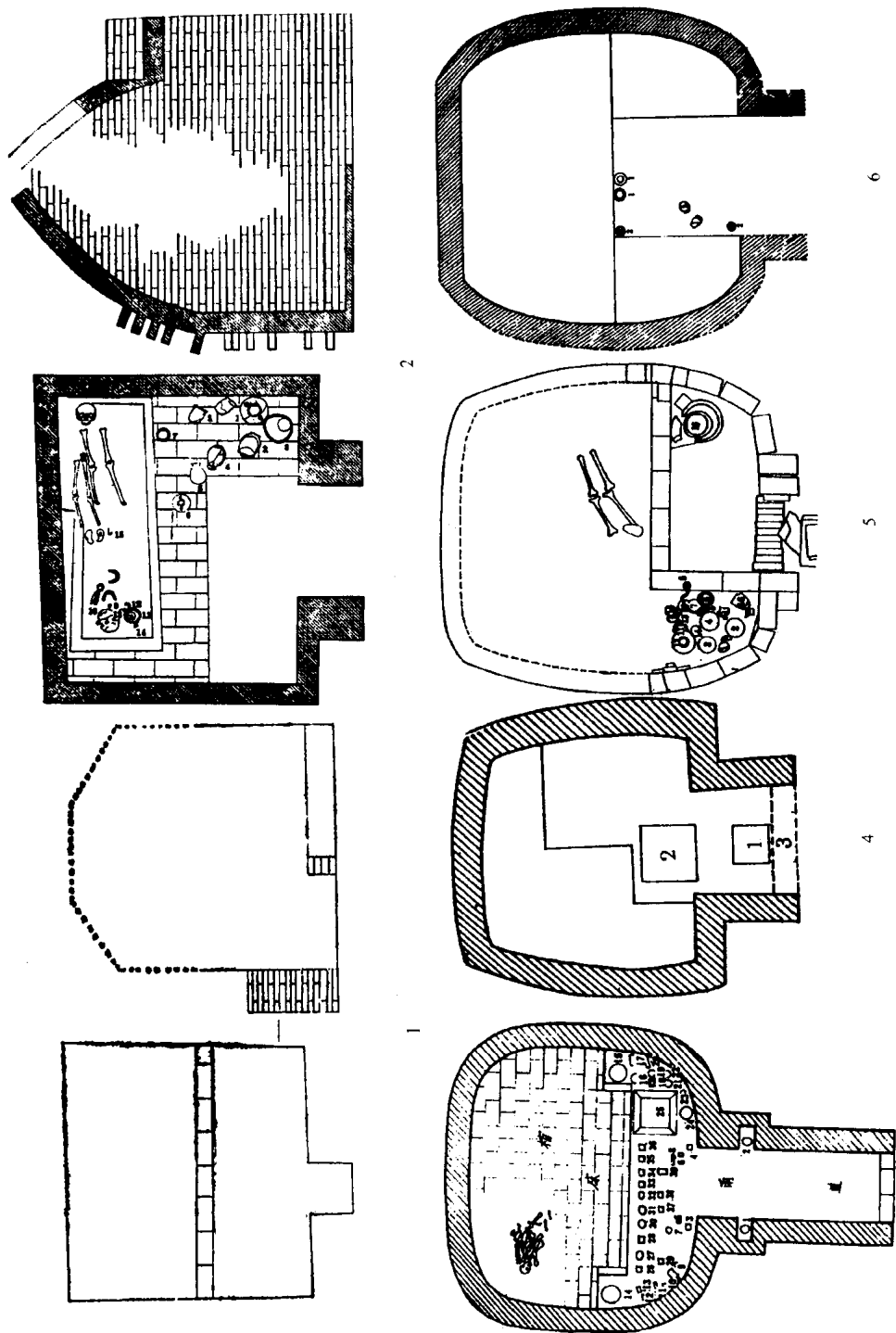
然而,在探讨东亚古代文化交流这一重大课题之前,首先对北方地区自身的特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仅完全必要,也是基础研究。基于这个想法,我首先要对北方地区7~8世纪的墓葬作一讨论。

通过对北方地区唐墓的初步整理,我发现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品或是葬俗,这一地区都有鲜明的特征,也表现出与中原地区、东北渤海、朝鲜半岛7~8世纪文化交流的过渡性。我的报告仅仅讨论的是北方地区的唐墓,但对其特征的归纳是通过与7~8世纪东亚其他地区的比较中得出的。

一、墓葬形制

中国北方地区发掘和发表的唐墓近百座,可分为四型。

I型:方形墓(图一:1、2)。北部设棺床,墓门向南,有的在墓室东南角设有平台。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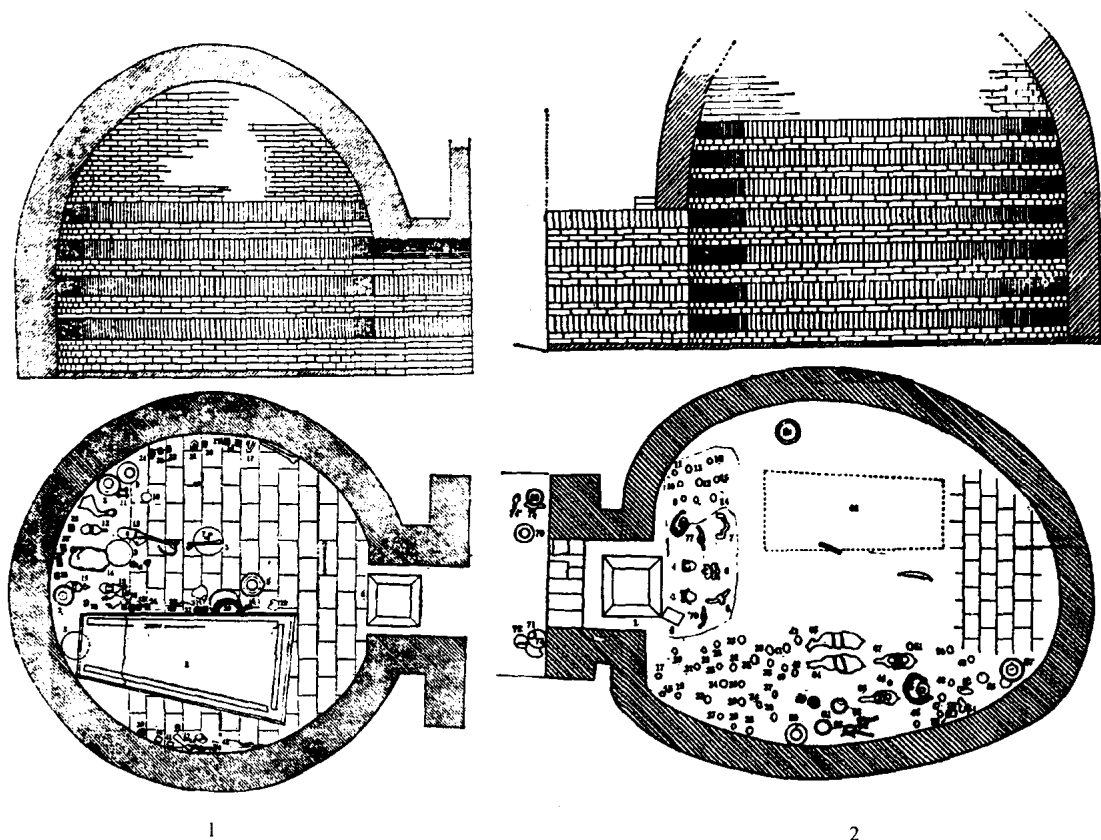


图一 北方唐墓形制之一
 1. 河南新乡张枚墓 2. 辽宁朝阳师范学校 M2 3. 河北南和郭祥墓 4. 北京丰台唐墓 5. 北京昌平唐墓 6. 北京清河唐墓

室为砖室,有个别土洞墓。以河南新乡麟德元年(664年)张枚墓、辽宁朝阳师范学校 M2 为代表。

Ⅱ型:弧方形墓(图一:3~6)。墓门向南,北部有棺床。以河北南和垂拱四年(688年)郭祥墓,北京昌平唐墓、丰台唐墓、清河唐墓为代表。

Ⅲ型:圆形墓(图二:1、2)。多为砖室墓。平面圆形,墓门向南,墓门两侧有翼墙,门上有额墙。有的墓门砌成门楼式,墓室中砌出仿木结构,有的墓用隔墙将墓室分割成几个小室,还有在主室外设有小室。以辽宁朝阳贞观九年(635年)张秀墓、辽宁朝阳左才墓、中山营子唐墓为代表。



图二 北方唐墓形制之二

1. 辽宁朝阳张秀墓 2. 辽宁朝阳左才墓

Ⅳ型:长方形墓。平面略呈梯形,有的是砖椁墓。

四种墓葬形制中,分别与墓主人的身份高低有关,但圆形墓与墓主人的身份高低要通过墓室大小、随葬品的种类、数量、质量来判断。

二、随葬器物

随葬器物在组合上可分为四组。

第一组:都有泥俑随葬。中山营子唐墓出土镇墓兽、武士俑和其他泥俑残片,还出有石雕头像、白瓷人头、陶瓷器和各种质料的装饰品、生产工具等。在一个墓志残块上发现“朝散大夫”的字样,这在朝阳地区应该是高官。保存最完整的是咸亨四年(673年)左才墓,随葬遗物共77件,其中泥俑48件,俑的种类有镇墓兽、武士俑、仪仗俑、侍俑以及一套怪兽。此外是厨房明器、家畜、家禽,还有陶、瓷、铜器。左才的官职是“口州司马”,为正六品职事官。贞观九年(635年)张秀墓,出了37件泥俑,有男女侍俑和仪仗俑,另有一个陶碗,一个陶砚。张秀官职为“校尉”,是一个下级武官,但有浮雕石棺,前面挡头浮雕一个门和两个守门者,石棺两边有青龙、白虎。另外,八里堡唐墓也有泥俑,年代为垂拱三年(687年),墓门两侧的翼墙砌出立柱、斗拱等仿木结构。

第二组:没有俑,但都有瓷器或三彩器,一些墓还有漆器或铜器。这一组墓只有1座墓出了墓志,墓主叫韩贞,葬于天宝三载(744年),官职为“检校蛤口戍主赏绯鱼袋”,戍主是镇守地方军队的下级官吏,官品为八至九品。

第三组:一般只有几件陶器和装饰品,有瓷器的很少。

第四组:随葬品较少,只随葬陶罐器和钱币。

上述四组随葬品,大体与四种墓葬形制相对应。第一组当是品官墓葬。第二组是有地位的庶人墓,第二组中的韩贞是下品官,随葬品中没有俑可能是由于时代在天宝三载(744年),此时俑已不流行的缘故,其地位应与第一组同。第三组和第四组是平民墓,随葬品的差别可能是贫富的不同。

此外,还在北京丰台发现上元二年(761年)史思明墓;河北大名县发现咸通六年(865年)何弘敬墓;正定县发现大中八年(854年)王元逵墓;北京姚家井发现薛府君墓;天津刘家台子的1座唐墓。上述墓葬破坏的都非常严重,何弘敬墓有石雕残块、石板、石柱等,王元逵墓是由墓道、前后室、甬道、东西耳室组成。薛府君墓为双室砖墓,出土有汉白玉雕十二生肖、刘家台子唐墓出土了一批陶俑,在墓室中有由6块大理石合成的石棺,左右两边有浅线雕。史思明墓出有铜牛,贴金铁马镫以及残哀册。从残存的情况看,这些墓比前面四组的等级高。何弘敬、王元逵两唐书有传,前者为魏博节度使,后者为成德节度使。薛府君为信州刺使,均当地最高官。史思明墓出土的玉质残哀册,也叫玉册。玉册是帝王和皇太子的随葬品。玉册中有1枚上面有“帝朝义孝乃因心亲惟□□”,的文字,玉册是嗣位的皇帝给已死的皇帝陵中的礼仪用物,称名的应是嗣皇帝,文献记载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自立为燕帝,上元二年(761年)史朝义又杀父史思明夺帝位。因此,应是史朝义之父史思明的墓。

三、北方地区唐墓特征

北方地区唐墓与西安、洛阳及周边地区的比较中,可显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 流行圆形墓,在已发现的墓葬中几乎占了一半。出土遗物丰富的墓,多是圆形墓或呈椭圆形的弧方形墓。从时间上观察,圆形墓在唐朝初年就已盛行。墓的结构上大多数都在门外砌翼墙。并早在武则天时就出现了仿木结构,有的墓内砌出放随葬品的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官品为朝散大夫的中山营子唐墓,直径达12.88米,并设有石墓门,墓内又分隔出五个小室。而作为下级武官的张秀竟有华丽的浮雕石棺。因此,圆形墓和砖椁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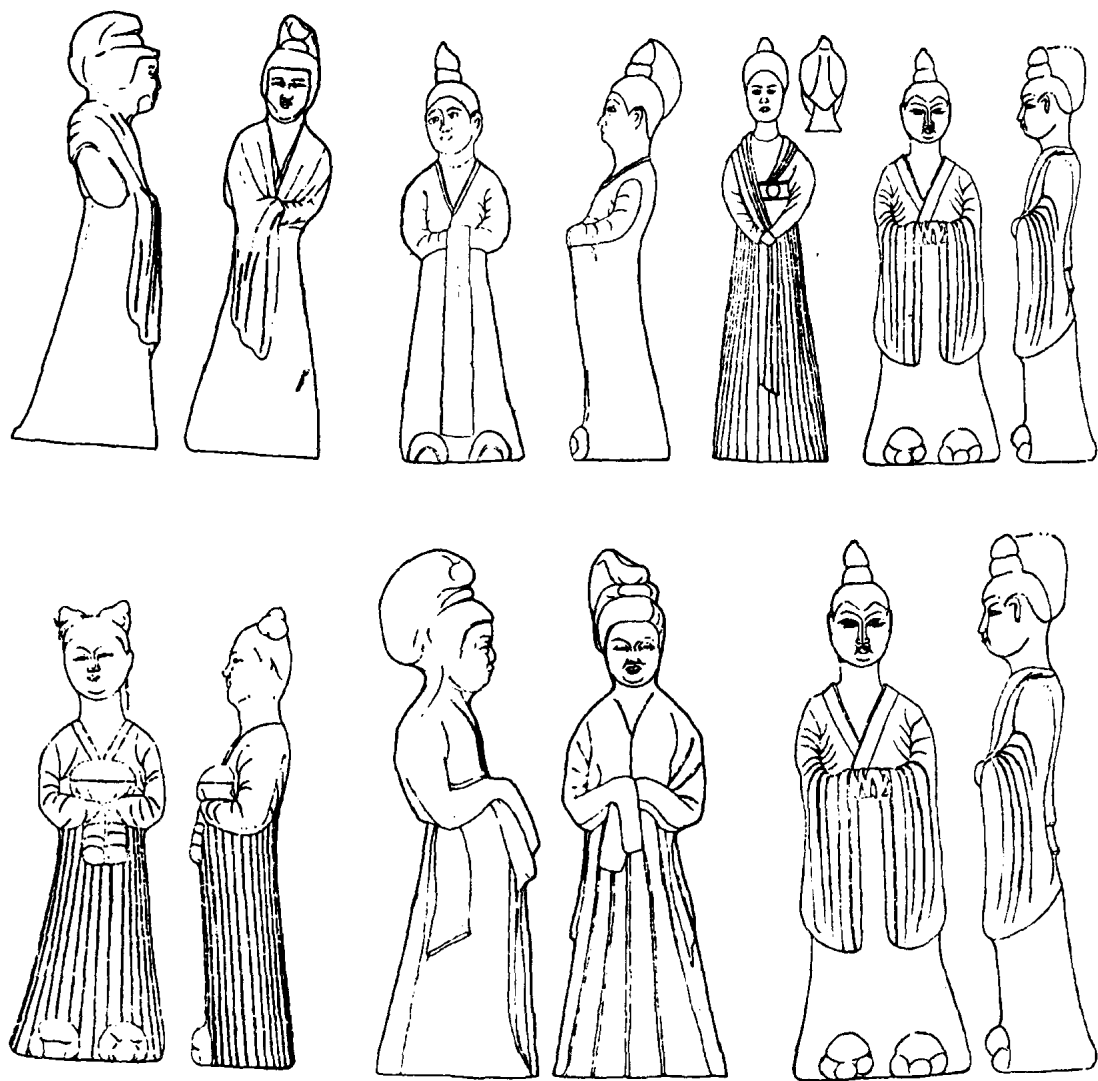


图三 北方唐墓的泥俑之一

构成了这一地区显著的特点。长方形墓有不少是砖椁墓。

(2) 随葬品中其他地区少见的铜容器在这里还很流行。大多数墓中都出土有铜、铁带饰。有的墓还用家畜、家禽实物随葬。

(3) 俑流行的是彩绘泥俑(图三、图四),泥俑的风格与其他地区迥然不同。武士俑头戴绘出鱼鳞状甲叶的头盔,身穿长条甲叶的铠甲,仪仗俑头戴绘出甲叶的头盔,身穿右衽窄袖长袍。显然与西安、洛阳地区同类俑风格不同。



图四 北方唐墓的泥俑之二

(4) 墓中出现了一套怪兽(图五)。有人首鸟身、人首鱼身、双人头蛇身、单人头蛇身和其他怪兽,在西安、洛阳发掘的大量唐墓中没有发现。表明两地的葬俗不同。这套富有特色的怪兽,一般放在墓室中部。